



中国文化
语言学丛书

主编/申小龙

苏新春 /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当代中国词汇学

汉语是汉民族扎根于汉文化土壤之中的
一套表达、交际的符号系统，

是汉民族认识世界的途径、样式，

它又体现出、也同时制约着汉民族

认知世界的方式。

只有把汉语词语放到汉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

才能做到对它有真正的发现。



中国文化
语言学丛书

主编/申小龙

苏新春 /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当代中国词汇学

汉语是汉民族扎根于汉文化土壤之中的
一套表达、交际的符号系统，

是汉民族认识世界的途径、样式，

它又体现出、也同时制约着汉民族

认知世界的方式。

只有把汉语词语放到汉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

才能做到对它有真正的发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词汇学/苏新春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9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申小龙主编)

ISBN7—5406—3208—9

I. 当…

II. 苏…

III. 现代词汇—汉语—中国

IV. H136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

当代中国词汇学

苏新春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1—8000册

ISBN 7—5406—3208—9

H·33 定价: 11.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用文化语言学理论来进行汉语词汇学研究的一部理论著作。它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主要进行了五个方面的论述：导致当代中国词汇学出现的百年研究传统及其反思；当代中国词汇学的语言观；词汇结构观；方法论；古代词汇研究的人文阐释。

以文化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当代中国词汇学出现在 80 年代，有着它的学科发展的内在必然性。长期以来，汉语词汇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有利于认读与写作来进行的。在现代，则受到语法研究领域的深深影响，走上了注重词汇结构形式的研究道路。这种学科发展的偏颇性在 80 年代引起了人们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在打破词汇研究僵局的长期探索中，学术发展的突破口渐渐清晰地显示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词义”与“人文”研究的引入。当代中国词汇学认为，真正健全的词汇研究应该做到两个结合：词义与词形的结合，结构与人文的结合。在前者的结合中，词义为主，词形为辅。在后者的结合中，结构与人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代中国词汇学希望建立起符合汉民族文化内涵的汉语词汇理论。它主张在对汉语词汇进行文化意义阐释的同时进行词汇结构的描写。这种研究不是对现有词汇知识的一种补充，而是重建汉语词汇本体研究的学科。

本书认为，在汉语词汇的“词语单体”“词语类聚”“词语形式”三个层面都渗透着汉文化因素。“词语单体”包括了词语与词

义的产生、演变、消失等诸多问题。“词语类聚”包括一个类聚中各个词语之间的关系与整个词语类聚的发育情况。“词形”包括词的语音形式、语法形式、文字形式。将词形从词语单体中分出来，是因为词形具有独自的系统性，对它的人文研究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理应受到人们更大的注意。在汉语所有词汇单位的研究中，单音词居于核心地位。在历史上，单音词是汉语词汇的源头，在现实中，单音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单位，是新词语的基本构成材料。它符合汉语音节的结构特点，制约着汉语语法的基本性质和规律，并深深地影响到汉语复合词的产生。只有真正了解了汉语的单音词，才有可能正确解释汉语词汇的所有其他重要问题。

本书将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面。在语言结构与人文意义方面，它主张“参照”为手段，“认同”为目的。在词义与词形方面，它主要由形及义，相互参证。

对古代词汇研究的人文传统，认为可以借鉴的地方主要有：“以字为词”的语言单位；“随文释义”的实用精神；“互文见义”的对称结构；“同义为训”的整体求解。

Abstract

This is a theoretical work which studies the Chinese lexicology with the theory of the cultural linguistics. It mainly covers five exposi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lexicological research; the caus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cology centennial research tradition and retrospection; viewpoint of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of the Chinese lexicology; viewpoint of lexical structure; methodology; the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lexicological research.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cology, guided by the cultural linguistic theory, appearing in 1980's, had the intrinsic inevitability of its subject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exicology centered on how it was advantageous to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In modern tim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grammar research, the Chinese lexicology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lexicological structure patterns. This deviation of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caused more and more people's discontent in 1980's. In the long-time search of breaking the lexicological research deadlock,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gradually displayed clearly. Tha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emantics" and "humanism" research. The

contemporary Lexicology considers that the real perfect lexicological research must have two combin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semantics and morph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humanism. In the former combination, semantics is primary and the latter is supplemental. In the latter combination, the structure and humanism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penetrate each other. Guided by this idea, the Chinese lexicological circle hopes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lexicological theory conforming to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It advocates having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lexicological structure. This research is not a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lexicological knowledge, b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the Chinese lexicological research in itself.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e Chinese lexicon the Han cultural factors had penetrated into "lexical monomer", "lexical class cluster", "lexical pattern". "Lexical monomer" includes generation, chang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characters and meaning. "Lexical class cluster" i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harac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character class cluster. "Morphological pattern" contains phonological pattern, grammatical pattern and pattern of writing. The morphological pattern is separated from the lexical monomer because the morphological pattern has its own system, whose humanistic research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so it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The author holds the view that in the research of all the Chinese

lexical units, the monosyllable character occupies the kernal position. Historically, the monosyllable was the source of the Chinese lexicon. In reality, the monosyllables are the most frequent used lexical units and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new coined characters. It conforms to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syllables, restricts the basic nature and law of the Chinese grammar and deeply influences the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pounds. It is possible to explain correctly all the other important matters of the Chinese lexicon only when we really understand the Chinese monosyllables.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book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iers. The author maintains to take "the reference" as a means and "identification" as a goal. In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 and morphological pattern, he maintains to get the meaning from the writing forms, and to refer to each other.

As to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the ancient morphology research, the author holds that we can use as reference as follows: the linguistic unit of "character as word", the practical spirit of "getting the meaning from the context", the symmetrical structure of "semantic interrelation of two characters", the integrated explanation of "annotating directly by synonym".

(英译: 邝嘉敏)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总序

申 小 龙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语言文字的研究与革新曾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冲突、震宕的先导，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之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热潮中，语言的研究与革新将再次拉开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序幕。站在这个新世纪的起点上，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跨世纪的一代，适时地回顾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努力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选择和建树新的理论、方法乃至文化哲学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20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它是在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船坚炮利”的“优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开始现代化的，由此形成这样一种研究规范：

其一，它不由分说地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范畴和体系，未曾考虑这些范畴、体系和方法源出于与汉语很不相同的印欧语。根据现有的语言资料，汉语和印欧语在结构形态、组织方略和文化精神上分别处于人类语言连续统的对立的两极。

其二，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形式化宗旨，把

形式化作为语言分析的终极目的，未曾考虑汉语没有印欧语那种丰满、裸露的形态标记，汉语的析解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更未曾考虑语言分析的终极关怀不是形式，而是内容。

这样一种研究规范使曾与中国文化血肉交融在一起的传统汉语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异化，即它不再以使用母语的人与文化为目的，而以某种理想化的形式为目的；不再以汉族人的语感作为建立范畴的深厚基础，而力图以西方语言的“科学”范畴来规范汉族人的语感。这样一种研究规范，在其长足的发展中，必然伴随着语文感受、文化心理的矛盾冲突与困惑。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文化断裂的深刻代价。

鉴于对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的反思，我们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突破西方语言理论框架，寻找、实践一种与汉语的文化性征相适应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设立了两个科学的参照点：

一、汉语与中国哲学、艺术、文学、美学乃至思维方式方面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这种通约性使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其他样式入手反观汉语的建构特点，从较深的层次上把握汉语的文化性征，以此规定汉语的整个结构蓝图。

二、中国古代语文分析传统中所运用的范畴和方法。这些范畴和方法贴近中国人的语感，在加以科学地整理和阐释后，能够转化为现代汉语分析的基础。

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文化语言学。近年来，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以汉语的人文性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与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的新语言学范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大批中青年语言学者正以崭新的步伐迈向 21 世纪。为了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学科系统地阐述

语言学新范式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奠定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我们撰著和出版了这套“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这既是一套中国语言学各领域的学科建设丛书，也是一套中国语言学各领域的理论、方法探索丛书。丛书中的每一本因学科对象和作者专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和重点，但基本上循着这样一个大思路：

首先是对该学科在 20 世纪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其次揭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从而树立新语言观；

再次是重新认识和阐释该学科在中国古代语文传统中的研究范畴、方法、理论，揭示其现代意义；

然后系统论述该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以丰富的材料对新方法加以实证；

最后展望学科在 21 世纪的前景。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走向新世纪的时刻，能够在语言学的十个主要学科——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理论语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学史学——形成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大思路，充分说明中国语言学的新规范正在中国年青一代语言学者的勤奋探索中孕育成长。本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必将为中国语言学划出一个时代。

本丛书的撰写邀请全国高校中卓有建树的青年语言学教授、博士参加。这些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运用人文科学的语言和方法，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成就。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语言学者，如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王力、陆宗达、罗常培、季羨林、吕叔湘、张志公、裘锡圭等的思想和传统，而且以自己新的理解和阐释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

本丛书荣幸地聘请著名前辈学者季羨林、张志公和许威汉先生担任顾问。他们对丛书的思路给予热情的肯定，并给我们以深刻的指教。季羨林先生对我们说：“汉语研究几十年来陈陈相因，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用中国文化的眼光看待汉语。”“一个民族典型的思维方式，是一切精神文明（甚至一些物质文明）生产的基础，它必然表现在各个方面。”季先生指出：

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泛、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主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重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

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1]

季羨林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我们这套“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思想和理论基础。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语言学者在这一点上有深刻的共识。何容先生指出：“自《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语法学，恐怕大部分通则，甚至整个的基础，是用演绎的研究法建立起来的。”“是把欧洲语言里的文法里的通则，拿来支配我们的语言。”^[2]王力先生指出：“现在我们天天谈汉语特点，天天还是在西洋语法的范围内兜圈子。必须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然后不至于被压在五行山下。”^[3]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指出：一个世纪以来，“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洋框框）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不从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向着复杂畸型的方向发展。”^[4]张志公先生指出：“我们的语法学至今很不成熟，主要缺点是不完全符合汉语特点，或者说，基本上不符合汉语特点。”^[5]“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者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

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6]陈望道先生说得更为概括:“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7]而季羨林先生的论述,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汉语研究这种缺陷的文化根源。他以一个东方文化学者的慎思明辨提出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现代意义,并充分肯定了文化语言学的运思方向。正如他与我交谈中所说:“用中国文化的眼光看待汉语,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是为了世界。东方文化一定会将人类的文化提到更高的水平。”

本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语言研究中的文化语言学大潮,本质上是东方语文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是历经“分析的时代”的中国语言学走向新的生命的一场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内成立了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并已连续六年召开全国文化语言学讨论会。日本中国语言学会和东京大学等高校也邀请我讲学。我深切感受到这场变革对于东方各民族语文传统寻求健全的现代转型的深刻意义。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不是为西方语言理论提供一个东方语言的例证(即使是作了很大理论修改的例证),而应是以对中国语言具有永恒意义的语文精神的现代阐释,去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识。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责任编辑姚自力、潘英伟先生对丛书及其作者的深刻信任令我们感动!两位先生曾与我专程在上海和北京拜访丛书的顾问和其他专家学者,充分论证选题,并在广州和襄樊先后两次召开全体作者会议,讨论撰写中的具体问题。正是在他们的促进下使这一宏大的科研、出版计划得以实施。我谨代表全体作者向他们暨广东教育出版社

表示深切敬意！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又过万重山！我们这一代学者从“上山下乡”中走来，将以自己不折不挠的毅力、创造精神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告别 20 世纪。新的世纪将是人类文化在新的历史层次上更为绚烂而非简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正像我为日本东京大学的题辞所言——

“东方语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

1993 年 9 月 12 日

注释

- [1] 季羨林《神州文化集成序》，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
- [2] 何容《中国文法论》，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3] 王力《语言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载《中国语文》1956 年第 10 期。
- [4] 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载《复旦学报》1980 年语言文字增刊。
- [5] 张志公《闲话语言》，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21 期。
- [6] 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载《教学语法论集》。
- [7]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

目 录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总序 申小龙

第一章 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 1

第一节 传统词汇研究的延续和发展 8

第二节 社会功能派的汉语词汇研究 22

第三节 结构形式派的汉语词汇研究 32

第四节 汉语词汇人文性研究的萌芽 38

第五节 现代词汇研究的特点和启示 48

第二章 汉语词汇当代研究的词义与人文趋势 54

第一节 当代词汇研究的词义化趋势 55

第二节 当代词汇研究的人文化趋势 74

第三章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语言观 83

第一节 语义为主语形为辅的语言结构观 84

第二节 结构与人文相统一的语言本体观 111

第三节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历史使命 126

第四章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词汇组织观 131

第一节 词汇人文研究的三个层次 131

第二节	单音词的语言地位与文化基础·····	159
第三节	复合词的语言价值与文化传统·····	185
第五章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方法论·····	208
第一节	认同与参照、阐释与描写·····	208
第二节	词义分析方法及认识论基础·····	218
第六章	古代词汇研究传统的人文阐释·····	224
第一节	“以字为词”的语言单位·····	225
第二节	“随文释义”的实用精神·····	237
第三节	“互文见义”的对称结构·····	245
第四节	“同义为训”的整体求解·····	254
关键词索引·····		261
后记·····		266